

（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人物追踪】	习近平文革经历考	彭小明
【不堪回首】	为了不被遗忘（下）	乐可常
【史海钩沉】	文革第一枪：新疆石河子“一·二六”血案	朱培民·余习广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人物追踪】

习近平文革经历考

· 彭小明 ·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统编教材已经将有关文革历史的叙述作了根本性修改，涉及毛泽东错误的文革动机，把错误一词删去。并且把这场持续十一年、祸患全国城乡各族人民的浩劫改称为艰辛探索跌宕起伏的曲折发展的一段时期。这种轻描淡写的笔触已经完全不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关于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和领导的浩劫”的历史结论。在文革受害者尚还健在的今天，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党政领导集团已经公然改削教科书，否定历史性决议，习近平的头脑里到底有什么文革印象？当年全国各族人民在苦难中煎熬挣扎，他和他的笔杆子头脑中的文革则是另一回事。国内外各种吹捧习近平生活经历的文章铺天盖地，我们不妨去伪存真，做一番严谨的筛选和分析。

◇ 平静的童年

习近平是陕北红军干部习仲勋之子。没有高干之子的出身，他无缘问鼎党魁交椅。习仲勋由于卷入“反党小说”《刘志丹》集团案，从1962年起即远离权力中心，所以整人记录较少。习仲勋为建立广东经济特区有过贡献，还有过“立法保护不同意见”的倡议，实属难能可贵。

习近平生于1953年，文革爆发时仅上八一学校初一（有初一班主任回忆文章）。因为年齿尚幼，文革之前的所有惨烈政治运动他基本不会有印象。与之同龄的青少年一般应有一点三年特大饥荒的饥饿难耐食不果腹的印象；但是因为当时北京和各省市高干家庭都有相应的营养特供。习近平当时刚上小学，印象也不会太深。在习近平识字能看一点小人书的时候（四年级1963、64年），已经是全国人民学雷锋的时代。他说他读过一点关于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那已经是属于幸运的了。那时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书籍都已经停止出版。1965年秋，他读了一年初中。1966年文革爆发。从此不再上课，后来说是“复课闹革命”，实际也没有像样的教材，教师更被来回折腾。

扫四旧并没有冲击到习的家庭。但是反党集团首犯的恶名已经缓缓袭来。习仲勋在1962年离开副总理职位，内部处分，仍保留公职，没有被逮捕关押，而且被周恩来一再叮嘱“不要想不开（自杀）”。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西宫所“学习”（接受审查）。习近平母亲齐心本来就在党校工作，实际上夫妇同在党校。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出任副厂长。这家工厂不是一般的单位，而是河南省重要的国营大厂。习仲勋当然不太会干预具体事务，不过是降级挂职，反省审查，拿一份干薪而已。但是名义上仍然是高干（十三级，刚够高干最低一级），他的子女依然属于高干子女。

文革从横扫牛鬼蛇神（打击地富反坏右）转入打击走资派的时候，习家才遭受冲击，抄家并扫地出门，迁出东城区交道口的四合院。这是给习近平少年时代留下印象的首次冲击。但是这次冲击并不严重，因为时间已晚于扫四旧的疯狂高潮，高潮中约有十万家庭被阖家赶出街巷，押解农村落户。而习近平一家远非如此凄惨；他们被安排搬入了中央党校，到习近平母亲工作的地方居住。在党校里面当然已经没有高干宿舍的电话和秘书、警卫员，但是衣食住行还是基本正常的。比起老舍、陈梦家等名人、一些资本家和小业主家庭，红卫兵用皮带打人、用开水烫人，许多人当场被打死，尚属幸运。这些红卫兵凶手就是毛泽东写信支持的一批青少年恐怖分子。此时北京的高校也出现了高干子女组成保守派红卫兵，打击领导干部、迫害教授和其他员工。毛泽东把矛头对准“党内高层走资派”之后，这一群所谓老红卫兵，几乎全部都是高干子女，逐渐感到压力，发现如果父母倒台，自己将失去一切特权和地位，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情绪，并开始发出对抗言论，乃至跟造反派红卫兵（多半是平民子女）发生肢体冲突，甚至冲击公安部等国家机关。

习近平的父亲也是从副国级高官跌落下来的副厂长级干部。在遭受抄家冲击之后，他的想法与联动思想一拍即合。于是跟着联动的一伙人起哄。因为联动的言论涉及鄙夷江青和中央文革，甚至涉及反对毛思想（所谓反对毛1960后的思想），而且联动的主要班底西城纠察队等组织私设公堂打人杀人非法关押严刑拷打，堪比纳粹冲锋队，民愤极大，公安部门不得不搜捕拘押这一伙法西斯违法分子。这批刑事嫌疑人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又被毛江周等人释放了，实际上是中共违背法治的又一典型。1967年1月13日已经公布的《公安六条》规定，凡有反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江青）、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行就是反革命。联动就是反革命。可是4月27日，这批人又被释放了，而且得到江青周恩来的接见。我们不要忘记，现代作家聂绀弩就是私下议论江青被判处无期徒刑，文史学者王学泰也是谈及《推背图》语涉江青而判处徒刑十三年，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多人被处决。各省市县乡不知名的类似反革命罪犯不可胜数。而仅仅因为这些人都是高干子女，所以就可以不按公安六条办案，就可以虽有刑事罪案嫌疑却逍遥法外。

◇ 首次政治参与：联动暴行

根据习近平传记的介绍，习近平曾经受过文革打击，例如曾经被关押，出逃以后，母亲齐心竟也不敢收留，主动将他送返关押地点，在批斗大会上受到挂牌批斗，甚至有枪毙一百次都够格的说法（估计是因为骂毛）。根据文革时期的生活经验（文革时代的大中学生今仍健在），仅仅因父亲有反党问题而批斗其年仅十四岁的男孩，是不可能的。现实的只可能是，习近平本人也有参与联动的过激行动，高呼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口号，坚持血统论的某些言论，高干子弟要掌权，红色恐怖万岁，乃至跟造反派学生发生肢体冲突……。他作为当时参与活动的初中生，常用汉字还认不太全，不大可能会有思想很成熟的举动，过激言行是可以想见的。毕竟抓捕联动的对象全部是高干家庭的子弟，毫无劣迹的人，而且看上去就是未成年人，一般是不会抓捕的。抓捕是在江青、周恩来、陈伯达商议之后，甚至是毛本人首肯之后执行的。而且执行的不是地方上的公安局，而是国务院公安部出动的干警队伍。被捕关押之后，再查出原来是文革前已经揪出的反党集团人物（黑帮）习仲勋的孩子，倒是会

作为典型被列举上报，虽然尚未成年，也会挑出来搞一回批斗。习近平的过激言行，他的母亲齐心应该是知晓的，所以他逃回家里，母亲也不敢收留，仍把他送回关押地点。而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回忆说，人家离京下乡都哭哭啼啼，而他下乡反而觉得感到“解脱”。为什么是解脱？当他下乡插队数月之后，再回北京，又一次被扣留，送进少年犯教养所参加学习班。为什么？说明其刑事劣迹绝不太轻。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有人说，依《公安六条》的反中央文革罪被捕判刑的受害人无论是处死、或服刑，嗣后都已陆续平反昭雪，联动一案是不是也该平反呢？不能一概而论。老联动孔丹为联动的辩护是非常片面的一面之词，陈云将联动罪孽一笔勾销更是对历史的亵渎。联动成员留下的暴力记录，血迹斑斑，说明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恐怖组织，早已作为文革时代暴力侵害人民权利的典型被载入历史。文革中因议论毛（林）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成员而获刑的冤案，一般都是言论触法，属于思想犯，例如聂绀弩、王学泰等案件，没有刑事案底，当然必须平反昭雪。可是联动团伙的主要涉案人中当时都犯有严重的刑事罪责。人身伤害罪、侵入住宅罪、侮辱诽谤罪不计其数，西纠红卫兵暴力打人的行为连毛泽东本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见陈小鲁回忆录），还有非法取缔民主党派（八大民主党派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团），非法冲击公安部，私设公堂、严刑拷打，都是明目张胆的公开犯罪。刘少奇、邓小平、贺龙、李井泉、刘宁一、孔原等高级干部的子女，贺鹏飞、刘涛、李黎凤、刘菊芬、邓楠、孔丹、陈小鲁、谭力夫、宫小吉……当时都已年满十八岁，有的是二十出头的成年人，多半都是中共党员或者入党培养对象。他们是应负刑事责任的当事人。

再从国际视野来看，世界上发生对政府不满而出现抗议和批评政府官员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民众对官员提出问责和批评是法治应当允许的合法权利。党政高官受到人身伤害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造成的，责任在党中央和毛林集团。不能因为高官受到冲击，就允许这些高官的子女无法无天、以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行凶打人、拿平民家庭出气，冲击机关和社团，践踏起码的法治和秩序。当然，法治社会不承认思想言论罪。联动和老红卫兵的言论罪可以平反，但是他们的刑事罪却因中共集团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包庇，从来没有得到追究。这些罪案一定要写入历史，昭告后人，绝不宽待。

联动的思想毫无可取之处。他们丝毫没有脱离毛思想的轨道，反而死死抓住的是毛思想中最腐朽最封建的血统论。对于毛泽东反民主反人权的权力意识却毫无批判，从未想到要让人民一起共同分享权力。联动不准革命，歧视平民，跟阿 Q，甚至跟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相差无几。文革五十年过后，北京实验女中前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案的主要责任人宋彬彬和前西纠主要领导人陈小鲁先后在北京公开向受害人表示道歉。道歉是一种进步。由于中国共产党目无法治的姑息，北京公检法机关仍然没有依法执行对联动和老红卫兵的刑事侦办。民间史家务必将相关史事翔实记载，以为补证。习近平属于未成年加入暴力团体伙，依法免于追究。但是文革的动荡，尤其是联动经历，作为他人生的首次政治参与，到底给了他什么样的影响，仍然值得研究。

◇ 习近平的文革遭遇

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说，习仲勋习近平一家经受了很大的波折和压抑。但是从整个中国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来比较，尤其是跟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跟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案比较，习仲勋案的处置又相对温和。胡风案牵涉 2 1 0 0 人，逮捕 9 2 人，多人死于监狱和劳改营，多人疯癫，仅极少数人生还；彭陆罗杨全都关押秦城监狱，九死一生，毛死之后才出狱。习仲勋的小说反党案发生时，文革还没有爆发。完全是党内处分，文革爆发后才有批斗的激烈情况。习仲勋不再去国务院上班，而是到中央党校“学习”，继续享有工资待遇，妻子只下干校，未入监狱。文革前夕，习仲勋调往洛阳，影响也不会太大，党的干部调动在北

京的干部群体中比较多见。刘少奇本人关押病死，王光美长期监禁，长子自杀，其余子女均受迫害，彭德怀、陶铸关押多年病死。而习仲勋没有判刑入狱，保留了高干身份，游街、批斗、仅仅聋了一只耳朵，相比之下，尚属幸运。习仲勋在批斗高潮过后，押送卫戍区的“监护”，实际上是一种保护。

习近平也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待遇，例如体育老师嘲笑他是黑帮的儿子，他因联动言行被批斗，甚至被关押在北京少年犯管教所，强制劳动，敷设下水管道。一度思想相当苦闷。所以他离京下乡的时候不但不哭，反而觉得解脱。他下乡的初期表现也不好，甚至传出他用面包喂狗的说法，反映他在农民和干部中印象不佳。他像多数知青一样，抽上了香烟。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习近平仔细聆听广播，没有父亲重入中央的消息。无比的失落使他苦闷徘徊，决定偷逃回京。可是立刻又被关押，释放后听从姨父和姨母的劝慰，才决定重回延安。少管所的牢饭肯定难吃，还不管饱。所以出狱之后，他前往陕西富平的姑母（习仲勋之妹）家里，姑母一天一碗羊奶调养多日，他才恢复元气。

此时此刻，姨父魏震五夫妇的劝说在脑海里回响。姨父姨母也是学生青年出身，到延安下农村成为干部。他俩督促习近平要接近农民，告诉他，“我们那时候就是要到农民那里去”……习近平从小只听到过父亲的一些正面训诲，要革命，要团结，并没有任何体验。父亲离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面承庭训。此时姨父姨母的话虽然并没有直接挑明什么秘诀，听起来却也如雷贯耳，很可能唤醒了一个他迷蒙中重要的直觉：历史上党的干部就是这样先下后上的，先在农民中一起吃苦，然后才会当上干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回到生产队，习近平从苦闷中回过神来。这时已是1970年，习近平收到母亲的来信，鼓励他努力争取上大学。上大学？母亲齐心毕竟仍是国家干部之身，她应当有机会看到了1970年六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北大清华关于招生问题的报告》。文件提出了从农村（非经考试）推荐青年上大学的方式。她同时也写信给梁家河党支部，请求帮助习近平追求进步。这一封“妈妈来信”大有趣意存焉。它是日后习近平得到推荐照顾的早期铺垫。既为照顾习近平打了招呼，又不像其他知青的干部父母搞口头或书面的强索特权那样难听难看。在习家恢复名誉之前做到了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生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的小干部们无不宠若惊，觉得习近平非同一般知青。从此，争取上大学也成了习近平的重要动力。

这时开始，习近平连续递交了多次入团（八次）入党（两次）申请书。多次都没有批准。肯定是不批准的。如果是敌我矛盾家庭的子女，一律不准入党。到底习仲勋属于什么性质，不要说基层党支部搞不清楚，报到县委、省委也没有人敢下断语。每一次递交申请书，都是一次对父亲问题性质的风向探测。一转眼，习近平逐渐跨过了生活关、劳动关。毕竟家里有一定的资金接济（他甚至自费去四川考察沼气，说明他比当地农民的经济情况远为宽裕），能吃饱肚子，再下力气干活，年轻小伙子是扛得住摔打锤炼的。

1971年九一三发生林彪事件，引发党内重大变故，更给受审查的人们增添了希望。比如林彪夫妇坚决打击的罗瑞卿，其子女就有了会见父亲的机会。习家子女也写信给周恩来，于是也有了1972年会见父亲的机会。会见就是一个信号。既然高干待遇没变，现在又在北京跟家属子女会见，说明是内部矛盾无疑。一切都开始松动了。仅仅过了一年多，1974年一月，上级回覆的精神说，“父亲的问题不影响子女”，那么就批准入党。以后习近平的仕途就顺风顺水了。入党当月就担任党支部书记。然后开发沼气，然后就被推荐上大学。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五名干部还热心地为习近平出具了一张土证明，说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更有甚者，多年以后，清华当时的领导干部刘冰回忆历史情景说，即使没有土证明，也会录取习近平。清华的工农兵学历到底给了习近平多少“化工有机合成专业”知识其实无关宏旨，他借此踏上了中国党政官场的阶

梯。实际上习仲勋的命运多舛，还没有跌入最深的低谷，没进监狱，没有完全毁损健康，反而大难不死，重返仕途。习近平的成长经历恰恰被这一段蜿蜒曲折完成了锻造。如果他跟一同下乡的几位知青一样，没几天就转回父辈老家插队，然后找关系参军，虽然也能入党提干，就远没有习近平的经历这样过硬和好听了。

◇ 文革是不是浩劫？

文革对于习近平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说实话，他父亲倒霉当然是党内矛盾的表现，但是并不是文革中的争斗，而是早于文革多年的反高岗 1953 年斗争的余波。文革浪潮袭来，将他们一家席卷累及。大约六年（1966 抄家—1972 会见）就基本得到解脱。从青少年成长的角度来分析，在最关键的入学、入党和婚姻方面习近平都没有遇到特别重大的障碍。他回忆青少年岁月，所有的沟沟坎坎仿佛都变成了“苏小妹三难新郎”的三个难题。苦涩和辛酸都已淡化，越嚼越觉得甘之如饴。对于当年农村的一穷二白他是有切身体会的，希望改变农村面貌也比较关心。但是关于法治、人才选拔、乃至整个国家制度的改革和进步，他越来越觉得还是毛泽东那些老八股更好。当年被关押的旧案因为年幼并没有留下案底，所以也没有造成仕途的障碍，也就不了了之。

至于当时骂江青骂毛泽东的情绪也已成过眼云烟。因为随着党史的进一步曝光才得知，当年陕北红军正在面临一场极左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干部已被关押，如果中央红军再不赶到叫一声刀下留人，他们早已横遭处决。所以毛泽东虽然错罚了习仲勋，到头来习家人仍不能忘记毛泽东的救命之恩。习近平进入权力中心，很难再想到党和国家制度方面的弊病。反觉得现成那一套顺风顺水。于是当然不希望前后两个三十年互相否定。他最欣赏的就是红色传统，红色资源和红色基因。长征路，延安情，西柏坡、一大会址……。他反复强调的更是红色基因。他深知，吃再多的苦，十次申请都不行。一旦确认了红色基因，就能入党提干，逐步成为接班人……于是，教科书改了，文革不允许否定了。

因为习近平从少年时代开始，到清华工农兵学员毕业（25 岁），是他接受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的关键期。这一段时期刚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而又动乱最频繁，思想最灭绝人性的时期。他的数理化生科学知识基础不超过初一水平，不懂外语。人性化民国教育的一点尾声，他太年幼，一点都没接上；改革开放之后的人文教育回归时，他已入官场，还陷入离婚期，也较少受益。步步登高以后，再学习和领悟新知的机会越来越少，登上最高权位时，更成孤家寡人。头脑中的岳飞、陆游、李白、三国、水浒、三言、两拍和毛选加在一起，忠君、爱国、义气，再加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和雷锋、王杰、红色血统基因的大杂烩，就形成了他抵制“西方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人权民主和普世价值的基本思想。

~~~~~

【不堪回首】

为了不被遗忘（下）

• 乐可常 •

（上接 z k 1 8 0 2 c）

（七）

我被禁闭的三天里，校内最大变化是，被大字报的已不是我的专利，学校领导控制得了几个小绵羊，但指挥不了一群狼。也许是因搞不出新花样而对我失去兴趣，一些不肯安宁的学生紧随全市乃至全国行情，将矛头转向校长和党支书。我看了写吴达泉的大字报，一张是揭发他母亲是宋美龄的贴身娘姨，这不是什么大案呀，主子再了不得，娘姨总是奴才。何况，做娘姨是实，“贴身”是作者为求效果显著而虚构的。这吓不到早过不惑之年的吴校长。还有一张更无聊，说他取名“达泉”是想“夺权”，这种谐音游戏纵写千百张，也无损一根毫毛。就这样，吴校长竟玩起失踪，并发展到投杭州西湖自尽。这个对葬身之地的选择，倒很有些雅士之风。可惜众多游客不肯成就他，奋起将他拖上岸来，他也就顺从地穿起整齐地安放在湖堤边的鞋子，那鞋是布的还是皮的，没留下档案。我觉得校长的求死，在时间上选择不当，倘不选大白天改选深夜无人时，其愿望定能兑现，但旁观者看不到轰轰烈烈场面，也是种欠缺。还有一点，我到现在仍感羡慕，投西湖，他可是史无前例，苏东坡有“欲将西湖比西子”名句，由此知道，他是何等香艳之举呀。

当时，学校里所有人都认为吴校长是假自杀，我也曾认同。但是，细细一想，根据同他四年相处，综合分析，他有惧怕的因素。他不是怕眼前两张大字报，他怕纵深发展，挖及他的老底。这个老底如果挖出来，在当时，即使不属犯罪，也会颜面丢尽，否则，根本无需演那出贞烈的闹剧。但是我只能运笔至此。历史求真，任何推理假设都属不宜。十六日，他被带回学校，因为“畏罪自杀”，已有定案，就此没有揭他的新大字报。他的苦肉计得逞了。

一个多月了，我只要踏进校门，就成了校内目光的聚焦点。吴达泉出事后，我便无人监管了。但是我不乐观。我觉得，此时的安宁好比是台风中心的宁静，更强烈的风暴随时都有可能刮起。大字报制就了劣迹斑斑的乐某人，能被忽略？做梦！同事们依旧不理不睬。我象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道将飘落何方。

那天，在大办公室批斗吴达泉，与会的除全体教师，还有些好斗的学生。一个多月来，在那样场合里，我只有站位，这次，我有幸获准一席之地，有何感觉？你去问一个罪犯，当他突然听到自己被无罪释放，会是怎样感觉？那就是我彼时心态。我脸无表情，心在驰骋。大会是怎么开始的，有哪些议程，有人发言讲些什么，都毫无印象。直到吕兰萍发言提及我的名字，心绪才闪电般归位。

吕兰萍：“吴达泉迫害乐可常就是为了转移目标，自己可以蒙混过关。”

那真是……我激动了，世界最美的乐曲也比不上兰萍那句话！我仿佛看到血压表上的水银柱急剧上升。此话如果出于普通教师之口，我不会那么兴奋。兰萍是谁？本校64届高中毕业留校的优秀学生，她是作为团委书记章钦宜的接班人来培养的，住宿在学校里。她说到吴达泉迫害我，决不是心血来潮。组织学生写我的第一批大字报，周六（或周日）撬开我的办公桌抽屉，偷走我的日记本，摘录日记内容，泡制“反动日记”，很可能，她是知情人。苍天有眼，我的冤情将大白于天下！可是，有人一句话又将我推进地狱门：

“乐可常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不要过早下结论。”

一声霹雳，水银柱爆裂！

从那以后，兰萍经常特意来大办公室，每见我，就会用木质报夹敲打办公桌，对着我嚷嚷：“你的材料，我们都掌握了，你老实交代！”我理解她，她并无恶意，她是在纠错。她单纯，善良，没学会作假，但有些胆小，深恐她那句话犯了丧失立场的错误。我就是犯过一次那样错误，险些带上“右派”帽子。她不敢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

警报尚未解除，做人仍需小心。但是我生性乐观，至少，我不再唱主角。我希望尽快淡出，被人遗忘。

没料想，高潮还在后面。

为了避免监督，其时，我已从余姚路三小的集体宿舍里迁出回家。自家的居室虽狭窄，总是安全。何况有母亲的关怀，疗平我心上的创伤。晚上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不必提心吊胆防备有不速之客来寻衅闹事。

八月二十五日，一出家门，发现街道两边商铺面貌大变：玻璃橱窗里展示的商品全线撤柜，一律以红色宣传品代之，店面门框和招牌一律的红色，店铺的名也改了，撞车最频繁的是“东方红”店招，饭店、绸布店、皮鞋店，直至售胸罩的也东方红了。西藏中路上两家电影院的名字也改了，不要“和平”要“战斗”；不要“大上海”要“遵义”。上海街道全线漂红，兵不血刃，一夜之际，革命成功。

那天，气温特高，办公室里桌椅发烫。这世象，连天老爷也不正常了。

教学大楼上上下下，楼前黄沙铺盖的操场上，人声鼎沸，扩音器里传播的语录歌震耳欲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我渴望站到革命人民方面，可我领不到通行证。我是阿Q子孙，还是“不准革命”！

断线的风筝落在最不该落的地方。

一群女将来办公室要押我去操场，我说我自己走。脚步沉重，我希望那楼梯永远走不完。我是在走向刑场。

操场四周，人头簇拥。操场中心空落落，一个平台，高约60公分。台上跪着郑启如，吴达泉，章钦宜，谭梅。楼西女厕所前，67届高中学生章秀华在话筒前大喊大叫。这位文革高人文化学习不怎么样，平时表现给我印象是自谦自卑，见了老师总是热情过头。我不清楚这次她以什么身份任总指挥，导演这场闹剧。她就辉煌了那一次，毕业分配去了组件五厂。后来听说在厂里偷窃被拿。那是后事。

不清楚怎样被推上平台，有人吆喝着叫我跪下。此生我还没有向任何人屈过膝。我挣扎，将身子绷紧，僵直不动。她们踢我，在沙地上拖我，我的皮肉不痛，心在颤抖（我写不下去了……）。

从台上滚下，又被数人扛上去。我大哭大叫，心里清楚，今天，她们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我屈服了。我感到羞耻，一脸怨泪。

什么都看不清，什么都听不明，头脑里一片空白。直到有人在身边大喝一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把饱蘸墨汁的扫帚从背上滑过，一阵凉意，我才有了感觉，疲软地瘫痪在平台上。

空旷的黄沙操场上只留下我一人。对我的惩罚还在继续：给整个操场洒一遍水。

眼镜碎了，鞋子丢了一只，头上浓厚的卷发里沾满黄沙；圆口棉白汗衫被墨汁染得很粗糙，领口下垂，露出半胸，西式短裤脏得象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我偷眼扫视大楼，二到四楼二十一只窗口，填满了密密人头，她们兴奋地看我的专场表演。也许，其中不乏同情者。

我拉着土著洒水车，赤脚，踏着发烫的黄沙地，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洒水，加水，再洒水，……心里反复念着：“看吧，你们看吧！”我要在那么多的眼睛里，让她们看到我的坚强。

满头满脸的汗和泪，流到嘴角，一样苦涩。全身湿透。我怀疑“性本善”之说了。大环境可以左右人格的走向。人性可以恶到什么程度？不怕恶不到，只怕想不到！

天黑回家，发现身上那件汗衫背部全黑，还布满了沙子磨出来的小孔。我曾将它藏在箱底，但后来还是将它丢弃了。怕的是，一旦被查出，那就是“变天账”，准备搞阶级报复、反攻倒算的证据，罪上加罪。可惜了，多好的“文革博物馆”的展品呀！

我一直在想，我终究犯了什么罪，要蒙受如此的人格污辱？终于，我醒悟了。我是有罪，“知识分子”这身份就是罪。祥林嫂因为嫁了两个丈夫，犯了弥天大罪，捐再多门坎也消弭不了她的罪孽；我沾上了这臭名，也翻不了身了。

人生啊，如果此生，我注定要倒几次大霉，那就趁我年轻，让我“霉”个透吧！

我准备着！

## （八）

九月三日早晨，雨下得很密。我是不能乱说乱动的，呆坐在办公室里。听说，郑启如在操场上绕着大圈子爬行。一旁监管她的是杨小牛，那年他十七岁，原海防中学初中生，因读不好书，又逢文革停课，索性退学顶他父亲来市一女中上班。其父杨生祥，山东人。年轻时是张作霖张大帅的兵，不知他怎么会流落上海，又怎么会到工部局女中（市一女中前身）做看门人。这一看就看了三十多年。他很尽职，长年有家不归，睡门房。只要本校教职工，无论多晚归校，不分夏冬，他必起床开门；腰挂一大串钥匙，总管全校门户。他每走一步，老远就能听见钥匙碰撞声，很有节奏。他退休时，已经老态龙钟，年纪当已七十朝外了。他的儿子真是生逢其时，才来学校，出身好，学校成立“革命筹备委员会”，66届高中生吴桂宝荣膺主任，他是副主任之一，享受副校长待遇。荒唐吗？不，只要比比王洪文，不会有更荒唐的了。杨副主任上任，我只记得两大政绩，一是眼前的事，要弄郑启如；一是吓死柴慧敏。

柴慧敏，宁波人。五十年代初，独闯上海，在中华路小学任教。为求深造，她考入北京俄专。毕业回沪，被安排在市一女中。不幸被戴右派帽子，长期在教导处任打字员。生性倔强，到死都没有摘除右帽。文革起，劳改队的建立，她一定暗喜着，她不孤单了，见了我，有说有笑。到了“造反有理”阶段，劳改队自动解散，只有走资派和右派分子不敢越轨，她又沉默了；有时还能同我说几句话，情绪消沉，自叹永无出头之日。我无语告慰。有一天傍晚，她独自爬上大楼楼顶平台，久久徘徊。校门对面是十七漂染厂，厂门卫工人见有异常，急告门房值班的杨小牛。前一天，小牛刚揍过柴慧敏。此时，小牛闻讯直奔四楼，上得平台，对柴慧敏大声喝道：“柴慧敏，你要干什么！”柴慧敏不作声，纵身一跃，了结她



苦难的一生。这过程来自小牛口述，他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事后，校方通知柴慧敏家人来料理后事，其家属不予理睬。自此，柴老师成了孤魂野鬼。此后，怕是再也不会有人提起她了，我谨用这几行字燃起一柱心香，遥祭斯人。唯同病者，才相怜也。

北京感冒，上海立即咳嗽。北京对“牛鬼蛇神”刮起剪发风，将被虐者的头发剪光一半，保留一半。那发式，美其名曰“阴阳头”，我欣赏，这名称很有创意，阴者，鬼也；阳者，人间也。凡被剪成阴阳头的，非人非鬼也。上海闻风而动。

郑启如在操场上雨中爬了多少圈，我不清楚，但后果看得清清楚楚。她被直接带到大办公室，脑袋左半边的头发被剪，留下被狗啃过似的发根；右边长发依旧，被雨水打湿，紧贴脑袋，本来就嫌窄小的脑瓜，此时更见比例失调。嘴唇上交叉封着两条医用胶布，大概是对她啰嗦的惩罚。白皙的脸庞苍白得象是刚从太平间车出来的遗容。她的眼神混杂着呆滞、疲惫、恐惧、绝望，与往时的支部书记形象相比，可以算是脱胎换骨了。市一女中教师中，数她最注重自身形象。皮鞋永远光亮无尘，西式长裤工艺考究，合身，裤线毕挺。一身衣装无论是衣料色调或款式，总是那么协调；头发一丝不苟，发端略作内卷，后来在看京剧“样板戏”《杜鹃山》时，怀疑柯湘发型就是仿她的。可眼前的她，我怀疑灵魂已经出窍。坐在她身边的是吴达泉，他正安祥地配合一位小将给自己剪发，发式与郑书记相同；章钦宜的头发也已被剪妥。一个初中女孩用旧报纸糊了顶高帽子，两侧结了棉纱绳，兴冲冲走进办公室，将帽子套在章钦宜头上，将两边纱绳系在颈下，然后取毛笔蘸上墨汁，在章钦宜脸上画了眼镜胡子。章张着无光的两眼（先天性盲人）木然而坐，任其摆布，不作任何反抗。

第二天，三只阴阳头作了三种反应，章钦宜剪了个光头，很超前：三十年后，上海女子才有此发式。但是，章钦宜是沉默的反抗；郑启如将一边长发移动一半支持另一边，不失爱美之心，但遮盖不了，有欲盖弥彰之嫌；吴达泉保持原样不变，他是控诉？是示威？都不是。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壮举。

那天我发觉被剪发的都是“8·25”大批斗的台面人物，奇怪的是没见到谭梅。但我不存侥幸之心，更多相信直觉：在劫难逃。没来得及考虑怎样应对，一群人涌进办公室，直冲我而来。瞬间，我被围住。老天佑我，是时，我的办公桌安置在东北角墙边，我依角而立，不必担心背后会有人袭击。真象说书似的，说时迟，那时快，两位悍将跳上办公桌，另一位从地面向我左边抄来，亮出三把剪刀在我头上盘旋，俯冲，就象三架灵捷的战机。我双臂交叉挥舞，织成一张严密的防护网，瞄准方向，还意图抽手夺她们剪刀。郑启如，吴达泉的阴阳头深深刺激了我，我不堪再一次被凌辱，决不让剪刀降落在我头上，不能有一缕头发让她们剪飞。我高喊“辩论！辩论！”那是当时最流行的用词。办公室里坐满教师，个个默不作声。那是无声的表态，为自身的安全，不敢声张。能那样，不愿与虎谋皮，我已经感激了。但居然还有位教师急步走来，她名叫蒋佩君（文革时，改名李学军），本校64届高中毕业生，留校任外语教师。那年也只二十岁，与在校高中生相差无几，胆子就大一些。她上来拨开人群，面对着我，当胸给我一拳，但毫无痛觉。听不清说了些什么，语气激烈。奇迹出现了，三把剪刀居然悄然退去！

世界上多见伪善，少见伪恶。做伪善者易；做伪恶者难，做了积德事还要被人误解，指责，甚至受罪。古人程婴算是伪恶者，今人蒋佩君也算上一个。当初妙龄少女现在早过花甲之年，与夫婿移居香港。我遥祝他们一生安康。凡有恩于我者，我没齿难忘。

孤独！强烈的孤独感幽灵般附在我心绪中。我常觉得身后有一张阴沈的脸冲我冷笑。夜晚，迟迟不能入睡，凌晨三四点钟会突然惊觉。我的精神已接近崩溃的临界点。我不但渴求友情，更渴望异性的爱抚。如果有女性能在我最无援的处境时向我表露爱意，我会不加思索投其怀抱而痛哭。

可是，我已经没有爱的权利，猪狗不如。

长夜漫漫……

（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我得到通知：为确保国庆期间社会安全，必须对阶级敌人实行监控。从即日起，学校部分性质严重的牛鬼蛇神不准离校。在劳改队中留谁放谁，我无从得知。有的写检查到晚上九、十点钟，还是被放行的。女性中，好象只有柴慧敏被剥夺回宿舍安寝的权利。“无法”的根子在“无天”。

教室改作监房。白天在这里写检查，我是白卷英才；夜晚在这里睡觉。连接两张课桌，便是床。长度够了，宽只半米，太窄。为什么不用四张课桌？非不用，是不准。每晚都是伸直身子仰卧，每躺下，我就会联想到殡仪馆里的遗体。一条薄被，是同事帮我从宿舍里搬来的，半做垫褥半做盖被。没有枕头。

夜夜不能得到安宁。教室里五支48吋日光灯，通宵强光。精力旺盛的女将们三五成群造访，可以随意将我喊起，或者一字不吭，抽掉我的被子。好在天气不冷，我又是和衣而睡，不至于出乖露丑。往往要过了午夜，她们闹倦了，玩够了，才放了恩典。

早晨起来，在水龙下掬水抹个脸，漱漱口，就算漱洗完毕。此后十八天，天天如此。没有洗澡，连人体排泄处都没有亲水的机会，比正经的监狱生活都不如。但是我很快适应了。我过得很平静。长期忧郁会患癌症，这说法不知是否科学，确有不少文人经受磨难时活过来了，但当精神解放时，恶病上身了。我不会！自然，我不是圣贤，周文王拘于羑里，演《易经》，如此镇定，我做不到。我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每天下午，人家下班回家时，我由羡慕而至失落。我会在此时想家，想母亲。在我从未失去过自由时，对裴多斐的诗很不以为然，“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太夸张了！此刻，我感悟了。

为了调节好情绪，我要自创乐趣。我创作了“拖把舞”，划动拖把，用腰部带动手臂，脚踏节奏，轻快地倒走。后来看谢晋导演的《芙蓉镇》里秦书田的“扫帚舞”，竟是如此相似！挖掘当时心态，那不是乐观，也不是对未来的信心，而是玩世不恭，是消沉的另类表现形式。我真希望自己是白痴，能整天喜笑颜开自由自在。

当务之急要解决睡眠问题。晚上睡不安宁，白天睡不得，铁打的汉子也折腾不起。坐在教室里写检查，眼皮沉重，脑袋渐渐下垂，笔尖戳破纸面；去走廊拖地，会不知不觉停止操作。听说，红军长征，战士可以边行军边瞌睡，你信么？我信！

终于，我找到个好去处，是无意中发现的。那天下午，我去操场东边男厕所方便，里边设置简便，一条长槽，上面用木板隔开，形成一间间半公开的无门小包厢。我上去背靠分隔板，蹲着办公居然睡着了！这地方，女性莫入。男工友见了我，装做没看见。真没想到，我在女子中学任教还会有那样的优越性。她们在教室里不让我安睡，在这里，我可得到补偿。但是，也有不满足处，时间蹲长了，腿脚发麻，麻得起不了身，行不得步。于是有了改革，

从操场墙角搬来三块青砖，在坑槽两侧各放一块，横向竖立，再在上面平搁一块，形成“兀”型坐具。坐在上面，两腿可以放松，闭目养神，顷刻入梦。几天后，又发现更好的去处，大楼东侧楼梯下，有间教师用的男盥洗室，按着两只抽水马桶，各据一小间，关上门，完全与外界隔绝，坐在马桶上，自然舒服。那简直是别墅！

有一次，我在“别墅”里渐入梦境，忽然听到“砰”的一声，有人使劲拉开我的“别墅”门。我急睁眼。一个青年男子，面目狰狞，立在面前。他大声吆喝，问我在干什么。我的睡意全消，心想，你不可能看到我何时进来，也就无法断定我来了多久，便冷冷地反问：“你不是看见了么？”他还想要挑衅，苦无借口，悻然离去。此人名叫顾庆澜，1965年高考落榜，区教育局安置他来我校参加培训，不属本校编制。他平时举止很有些女性化，这回竟有如此杰出表现，深感文化大革命之伟大，磨练造就了大批那样的人才。现在，发现女性化的男子又多了，我看最佳的疗法是再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

从顾庆澜的突然袭击，我得到了教训，居安要思危，有备才无患。

上海人称吃饭为加油，不知有没有把睡眠称作“充电”的。白天，我在厕所里充足了电，夜晚就赛神仙了。我不再在乎络绎不绝的访客。

每天晚上有闹剧，不见有内容的重复，但大多是即兴篇章。其时，大串联已经遍及全国。学校底层教室可能改作串联学生的集体宿舍。在夜间我见过些男孩，那些人很不讲卫生，东办公室地上一滩青黄色浓痰留给我太深印象。因为小将们在推搡郑启如时，郑的一件新毛衣从手提袋里掉出来，没等郑去捡拾，有人一脚把它踢到浓痰上，再用脚踩毛衣，反复擦拭。真该死，她们应该先擦干净自己肮脏的心理。牢房里也有戏，一群人强迫吴达泉和谭梅拥抱，谭僵直不动，吴是有令必行。观者大笑，独我觉得革命革出了无聊。第三出戏轮及我了。

主角王玉凤，初二学生。名字虽美，其貌不扬。鼻梁上一副千度以上近视镜，小头小脑，上身一件玫瑰红“的确凉”长袖衬衫，下穿什么？没看清。进来时，左手托一搪瓷碗，内盛大半碗墨汁，右握一支大楷笔。止步在我身前，勒令我面向她，站定，于是在我脸上画了起来。冷悠悠的毛笔在脸上滑动，不难受，难受的是她对我人格的戏弄。我装作脸上被毛笔刺激得痒痒的，提手去挠，趁势撞一下她的左臂，她手中墨汁溅了出来，污了她上衣。她一怒之下，将墨汁全泼在我身上。我穿的是“劳改工作衣”，本就肮脏，半碗墨汁，于我何伤。现在回想那事，笑自己太“小儿科”，但在当时真有报复破坏的痛快。

半碗墨汁不解恨，王玉凤又罚我站水汀。水汀高不及一米，是工部局女中留下的遗迹。安在室门口黑板左边，早已弃置。我提腿跨了上去。有人叫谭梅也上来，我坚决不答应，说：“她是右派，我要和她划清界线。”但那理由很不充足，我是什么身份？现行反革命！一丘之貉。可是，小将们居然认可我的理由。

《孟子》曰：“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簞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如今，吾当乱世，居不如颜子，食不定时，寝不安，屡受肌肤之痛，人格之辱，仍不改其乐。不输颜子。何以无人为吾作传？吾自答曰：“今世无孟轲。”

（十）

十月一日那天，我“乐”不了了。历年的国庆情景一幕幕展现，历历在目。小学生时期的化装游行，充当小号手；中学里彻夜狂欢，跳集体舞，“我们的祖国是乐园，花园里的百

灵鸟歌连天……”轻快跳跃的曲子，热烈欢乐的歌词，沉浸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我在内心深处呼喊“祖国万岁！”高中三年，年年参加国庆火炬接力，西藏中路南京东路那最繁华路段，两边人行道上灯火辉煌，人头簇拥，开阔的路中心只留我们火炬手在慢速前行，自豪，兴奋，真以为自己在主宰着苍茫大地的沉浮呢。大学期间，适逢国庆十周年大庆，我们在广场演出。有一年国庆之夜，我和初恋的女友漫步街头，观赏节日彩灯，默默地走过午夜，心中装满了温情。国庆节日，留给我的尽是欢乐和温馨，从未遇到过今天那样的冷漠无情。我象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上午，广播里我听到林彪在演说。学校里反显得冷冷清清。我独自躲到操场南侧校办工厂楼上，痛快地哭了一场。这一天，我非常认真地考虑了国家的前途，我担忧。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只有彻底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从现状看，无产阶级的敌人有增无减，一人墨面，三代株连。又将我们无辜的知识分子推向敌对势力，长此以往，无产阶级革命家岂非要成为孤家寡人，无产阶级的神圣使命何日完成？进而我想到了不敢想的可怕的结论：当权者没有按共产党的宗旨办事。

“树欲静而风不止”是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术语。我有了新解。“树”是谁？老百姓。“风”呢？斗争学说的创造者。语文教师朱宗焕在课堂上讲解鲁迅的《友邦惊诧论》，文中有句“国民党屠戮人民”几次错读为“共C D屠戮人民”，购成罪名，进了牛棚。文革后也没让他进课堂，一个十分自信十分健谈的汉子，从此灰心丧气，沉默寡言。在学校图书馆里混到退休，在压抑中离世。只有白痴才会跟着说，朱宗焕是“风”。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夜。就在那一天，袁绣声请了赵志强来揭发我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言行。已经趋于冷场的学校革命气氛再一次掀起热潮。我被押到赵同学的报告会现场示众以后，仍被押回大办公室。我没有开灯，置身在黑暗中，可以不让人发现，有安全感。报告结束了，人走完了，灯也熄了。为什么不放我回家？还会有什么遭遇在等我？

办公室的门开了，进来了两男一女。女的是本校67届高中学生钱士珍，我没有教过她，但是知道她名字。并非因为她特别优秀，只怪我那时的记忆力较强，凡有些特色的学生，只要有一次听到过她名字，就会记住。而她，有了这一次遭遇，就一辈子忘不了啦。她那黝黑的脸上安着个大鼻，略显外翻的上下嘴唇，深度近视，很特色。此刻，我从她多圈的近视镜片后看到的是威严的目光。我才相信权力可以造就新人。狮子之所以凶狠，因为它有锋利的牙齿和锐利的爪子，一旦失去那两件武器，它连兔子还不如。反过来说，如果兔子有了狮子的爪牙，它就是狮子。现在，我眼前那曾经的兔子业已变成狮子。过去的她似乎有些自卑，在班内默默无闻，朋友不多，常见她走在路上低眉颌首，独自来往。

我有些纳闷了，文革中冒出来的怎么都是些老师心目中平庸的学生？是当初老师看走了眼，还是时势造就了庸才？我不清楚她现在是哪路诸侯，看她气派，来头不小。

进了门，带头的钱士珍侧身让过；后面两个汉子，一个精瘦，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一个壮硕高大。前者说他来自兰州，后者自报山东济宁。

我真不愿意记录接下来的过程，那是我的耻辱，我的表现很丢脸。为求历史的真实，我不作掩盖。

“站好。”声音平和。

我双脚并拢。

“头抬起来！”语气硬了。

我抬头。

“听说你很不老实。”声音依旧平和。但他的动作让我不安。那瘦子边说边解下腰间牛皮军皮带，猛地一挥臂，我的后脑勺被硬物重击一下，眼前一片漆黑，黑幕中缀满不规则的血色星群，一闪即灭。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体味，我害怕了。当我恢复视觉重见那魔头时，赶紧摇着双手，哀告着：“别打了，别打了！”（写这些往事的感觉也不好过，一字一鞭抽在心上。）

没有说理的地方，没有法律保护，打死了，无异摁死一只蚂蚁，还会编造我畏罪自杀的谎言。已经有太多太多的社会精英死于非命，因为他们选择了尊严。我非精英，我选活命。

他们叫我低头，再低头，直低到脑袋碰到膝盖。钱士珍在我背上用白浆水涂字。

人们，请记住，千万别让卑贱者掌权，别相信“卑贱者最高贵”的鬼话。这类人胸襟窄，气量小。一旦权在手，会变态地卖弄他们的威严，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小人得志肯定会猖狂。

凌晨二时，我被释放。那天的遭受，从根子上分析，我要感谢袁绣声的恩赐。

（十一）

一头乱蓬蓬浓厚的卷发，一脸连鬓胡须，脱下麻袋呢夹克衫，卷起来，夹在腋下，那件上衣的后背被钱司令涂满白浆水，我不愿将它示众，我已经出丑太多了，踏出校门，深深吸一口气，自由，真好！脚上穿的是“解放鞋”，仿军用品草绿色低帮球鞋，适合跑步。

从余姚路99号门口起跑，快跑，早些回家！

折入西康路，快跑，早些回家！

穿过康定路，跑，再跑，早些回家！

左转弯，新闸路，有些气喘，不要慢走，跑！早些回家！

穿过陕西北路，泰兴路，石门一路，成都路，黄河路，快了，快到了！加油！

那年代的都市夜景已成绝版，而今而后，再不会重现。电线杆上高悬着白炽灯，那昏黄的亮光是街上唯一光源。马路两旁楼房门窗紧闭，路上看不见任何活物，连车辆也不知缩在哪个角落里睡去了。抛在我脑后的是我单调的脚步声，上海成了一座空城，只我一人被遗弃在街头。

跑着穿过温州路，长沙路，西藏中路，踏上北京东路，终于到家了。不知那来的内力，居然是一口气跑完全程。

走进850弄，在第一条横弄上左转弯，抬头看前上方，一股热流急剧上涌，我的眼眶湿了：不远处三楼亭子间的窗口，射出一道亮光，整条弄堂唯一亮光，母亲在等我！哦，妈妈！这世界只要有你在，就值得留恋。

七点六平方的亭子间，简陋的家具。床边写字台上摆着两碗菜，荷包蛋和红腐乳露肉丝炒百叶丝，都是我最爱吃的。一包光荣牌香烟，一瓶绍兴黄酒，母亲坐在床沿，一脸平静，好象儿子是中班放工回家。我明白母亲的心，她将焦虑埋在心底，不叫儿子生丝毫愧疚。

我默默地喝着酒，默默地点燃烟。我感觉母亲慈祥的目光一直在我脸庞上扫视，她不问，但很想在我脸上读出：今晚怎么了？

我已经有了打算。

“妈，我要离开上海。”我很平静，就象拉家常，守口不提昨晚今晨发生过的事。我知道母亲不会反对儿子的意向，她相信儿子。五个月来，儿子一次次受折磨，她都记在心里。但是儿子从未有逃离学校的念头，尽管她不知道这次发生了什么，但儿子那么迟归家，那么狼狈的形象，那么不安的神情，她都看明白了，儿子的生命受到威胁。

“去躲一躲也好。”这是母亲今晨唯一的吩咐，一个“躲”字道出了母亲的倔强，“逃”是认输，“躲”是避开锋芒，儿子没有输！她没有文化，但她有骨头。

如果孤立地看我挨的那一鞭，不能说严重，严重的是全国大串连开始，市一女中也接待外来大中学生，其中不乏打人成性的暴徒，这次来的是兰州的，济宁的；下次还会有北京的东北的，而我已经是以最不老实闻名全校，北京副市长乐松生就是被活活打死在大街上。学校腰门前矮墙上鲜血般巨幅标语“红色恐怖万岁”在作无声的煽动，让人头脑发热发狂。环境越来越恶劣，今非昔比，六月的大字报在今天看来，太温文尔雅了，生死攸关，谨慎为上。

临走前，我给校方发了一信。当时社会上大小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机构一律称“革命委员会”，学校校长改称革委会主任。市一女中领导机构处在筹备阶段，领导机构全称是“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吴桂宝，66届高中生。市一女中的学生出身大多属于非工人阶级，吴桂宝就在那一点上与众不同，于是成了市一女中的“宝”货，于是荣任主任。我看她也没有实权，只不过做些具体事务性工作，要不然，我那一鞭子的账就要算在她头上了。我与她不熟，所以，信是发给副主任吴云的，她原是68届（二）班团支部书记，我是这班班主任。那封信是我文革以来唯一的一次申辩，我简述了旧社会苦难的童年，新中国给我带来幸福的青少年生活，我的历史是清白的，反右斗争表现，组织上的结论是明白清楚的，我走上人民教师岗位，是党培养的，我要为党作贡献，我的生命不属于我个人，保护好自己，也是对党负责，现在，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不得不离开学校，离开上海，时间将证明我无罪。最后，写上万岁万万岁口号，是当时流行格式。

母亲坚持不收我的安家费用，我带着48·5元人民币，是我的全部积蓄，乘船离沪。船票，3·60元。

明天是发工资日，我被迫放弃，只要活着，钱，会有的。

（十二）

一九五七年，我在反右斗争中受团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具体详情不交代清楚，读者始终会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关键是要说清楚为师以耀辩护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是我受处分的根源，所以，现在是补述的时候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发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第二年春，全国农村建立了九万五千多个初级社，那些农民在土改时分到的土地又被夺走了。一年后，发展到四十八万余个，再一年，七十五万六千个。如此迅猛发展，基层干部严重不足，

干部队伍中滥竽充数，鱼龙混杂，在所难免，一些生产合作社出现腐败，也属正常，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农村干部金旺就是个典型。

当时，师以耀家乡徐州农村流传的民谣揭露了这种现象：“社长见社长，身上穿大氅，吃饱饭，没事干，去跟寡妇打交道。会计见会计，脸上笑嘻嘻，腰里忽喇响，尽是人民币。社员见社员，两眼泪涟涟，你也没有柴，我也没有盐。”师以耀在整风运动中引用了那三段民谣，揭示农村问题。就那三段民谣，虽非师某编造，帐却算在师某头上。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陈章亮无限上纲，他那段名言至今难忘：“社长会计是党的农村基层领导，是连接党和群众的桥梁，师以耀否定农村基层领导，就是毁坏桥梁，从而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了党的领导，否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如此拙劣的推论，居然博得全场掌声。师某定为二类右派，开除学籍，押送回乡，三首民谣葬送他一生。

我为师某辩护的依据是凭三首民谣不足以给师某下结论。为此，我被定为严重丧失阶级立场，撤消团内职务，并给于团内严重警告，我的漏网右派名声由此而来。

我躲回老家宁波，落脚在鄞西高桥乡陈家村，那是我姐夫的亲弟家。旧时代的亲情远胜于现代，姐夫的亲弟，这关系很远了，现在，我妹夫的亲弟就素不交往，就是路上碰见，也形同陌路。而那位亲弟，我们就象亲兄弟，他比我大八岁，躲在他家，他待我如上宾，过了五个多月“贱民”生活，一下子很难适应，这就叫“贱痞贱相”。

是时正当秋收，我要求参加劳动，闲着很无聊，更重要的是将来返校可以有个交代。于是，下来第二天，我就下地挑稻谷了。上肩，挑起，起步，走动，我不输于他们，赢得一阵赞许，心头的阴霾逐渐被化解，纯朴的乡情让我重新拾起做人的尊严。这里就是现实的世外桃源，远离城市，没有暴力，没有震耳欲聋的语录歌，没有乱七八糟的市容，没有大字报，没有军皮带，没有军便装，没有红袖箍，这里甚至不染一点“红”色，还是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田头尽是庄稼人，农舍依然旧模样。

有一个问题，当年不曾想过，时隔四十五年的今天，我想到了：城市恐怖化了，农村为何那么平静？我的答案是：农村公社化虽不是农民意愿，但农民如果不理庄稼，就没饭吃。而城市里，学生不读书，一样活；大串连，到哪里都有饭吃，免费旅游，何乐而不为！工人不干活，工资照领，衣食无忧时，上面一煽动，不乱白不乱，人的堕性和恶念充分暴露。进而想到，如果市场私有化，文化大革命还闹得起来吗？

苦难的日子，度日如年，轻松的生活，度年如日。我在陈家村，一晃二十多天，城市动态，一无所知，直到大姊下乡捎来上海家信，才知行情有变化，我决定回上海。

二十八日回家，母亲告诉我，我离家第二天（五日）就有人闯来，气势汹汹对母亲，要知道我的下落，索取我的照片（印发通缉令）。母亲反复只答三个字：不知道，来人一无所获，临走，扔下一句话：“没那么容易！”

现在我要说：“就那么容易！”我回来了。

（十三）

停课闹革命初期，学校热闹了好猛烈的一阵子。闹到此时，再闹不出新花样。学校的小天地已容不了学生们膨胀的心，但我宁可相信多数人激情过后归于冷静。她们的大串连走向全国，也是苦旅，在家里做逍遥派才是上选。工人出头唱主角了，大学生杀进社会，中学生

的“革命饭”吃到头了。二十九日，校门口冷冷清清，不见一人。甬道墙上的大字报几被撕尽，只留些被浆糊牢牢粘住的残片。进腰门，走廊上遇见吴大主任，圆黑的脸庞上嵌着一对金鱼眼，还存三分威严，我不自觉地凛了一下。她倒客气，往事只字不提，随意说声“你回来了”，擦身而过。这回，我悬着的心放安定了，形势真的变了。

“牛棚”竟然还在！设在底楼东侧第一个教室里，就是六月份迷宫般张挂揭发我的大字报的那一间，已经没有人监管。但因为没有人向他们宣布过撤消“牛棚”，也就没有人敢走出“牛棚”；而吴主任也不敢宣布解散“牛棚”。监管和被监管的都怕形势逆转，小心为上。做人太老实，太安分守己，也容易受欺。这类人最让人生气的是，他们的依赖性太强，在人生道路上，处处小心，逆来顺受，不敢越雷池一步。我怀疑，那正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

我踏进“牛棚”，招来一阵骚动。我发现，“牛棚”内情还是有变化，气氛轻松，人人谈吐自在。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我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一个敢于逃跑的英雄！太讽刺了。史无前例的年代产生史无前例的怪事，此为一例。

有人说过，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英雄而人为地制造英雄的民族更可悲。我说，没有英雄的民族，一边是人人自诩为英雄，一边是不断出现悲剧英雄，这样的民族只有可怜和无救了。

我们的谈话还在继续。

“逃跑也是反抗。我们连逃跑的勇气也没有。”

我反抗了？没有。反抗者敢于藐视权势，而我，屈从权势。离校时那封自辩信便是明证。逃离后，仍不忘和工农相结合，到农村去挑稻谷，还在追求脱胎换骨，我对党的忠诚，天地可鉴。

一头虔诚的蠢驴。

送走一九六六年，也送走了我的人生中一段苦难旅程。当时不敢奢望从这里起步，道路会越走越宽。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再回顾自己留下的脚印，我可释然了。但是一九六七年，小而言之，于校；大而言之，于国，灾难还在继续蔓延，且有越演越烈之势。这一年，学校枉死了两位苦命人：先有俄语教师柴慧敏跳楼，后有语文教师张厚墉，在全校教师封闭式（日夜集中在校，不准回家）学习班中不能忍受工宣队的逼问，凌晨从操场北墙边老式垃圾箱里钻出，逃至松江投河而死。听说，前一夜，工宣队盘问他时，他曾要求负责人允许他找我谈谈心，他想谈什么，成了永远的谜。这一年，由王孝钊等人策划联络戏剧学院狂妄大队绑架物理教师王乃干，王乃干的牙齿被打落；周凤稚老师因姐夫所谓驾机投敌案遭牵连；某老师因生活作风问题在闸北公园被扣，押回学校挨斗；梁祥禾因为“防扩散”案被隔离审查，两度遭难；体育教师徐某，据说是三代矿工出身，根正苗红，重点培养对象，却因将68届高中生带进宿舍，东窗事发，对他的处理在当时很有包庇之嫌，应其本人要求，调去江西。至于校外，乱得我看不懂：才荣升中央常委的陶，突然名字被倒写再打叉的大字报赫然贴在中百公司的大橱窗上，那是一月四日的事。正是：剧场无戏看，人生处处戏。

一天一夜，都是不变的24小时，但那24小时走的速度有快慢。一九六六年后半年最慢，之后的十年也很慢；再后来的时间越走越快，似乎就在一瞬间。突然发现青春不再，镜子里见到的已是白发稀疏一脸皱皮的老头了。“人生如梦”，大概到了我这年龄才会有实



感。既为梦幻，何必认真，这一悟，悟出了平静与宽容。对章秀华、宋爱娣、钱士珍，我毫无恨意，只为她们可惜。我希望她们活得健康开心，告诉子辈，莫要不分是非图一时风光荒废前程。市一女中涌现很多人才，她们抢时间做学问，在各自岗位上事业有成。很高兴，她们还记得我，那真是一笔莫大的精神财富！我珍惜。

拨乱反正后，从良心上讲，我最感恩的是邓小平。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我没有水平论其长短，我只提他的一句话：“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就这一句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脱去资产阶级帽子。正是：历尽劫波，难成正果（指没完没了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小平一言，机关道破。我这蠢驴经他一点拨，才知那帽子本就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说有就有，说无就无；私心重的人，才会中其魔法，惶惶不可终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懂得“资产阶级的可怕，不就是“老板”么，求之还怕不得呢。但当年这帽子就象如今的“艾滋病毒携带者”，谁敢接受！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是两度遭劫难的余生，更珍惜平静安定的生活。

（完）

（本文作者乐可常为上海市第一女中教师。）

□ 来源：《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

【史海钩沉】

文革第一枪：新疆石河子“一·二六”血案

• 朱培民 • 余习广 •

1967年1月26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地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部队对所属的造反派组织“石造联总”群众在石河子地区发生的开枪杀人事件，此后，新疆自治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又连续制造了系列大血案。史称新疆石河子“一·二六”血案，又称文革第一枪。

该杀人事件由两大流血事件组成：毛纺厂血案；八师“反夺权”血案。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第一次发生的军事部队参与武斗、大规模开枪杀人制造的流血事件。被称为军队打响的“文革第一枪”。事血案发生后，围绕该事件的责任问题，又发生了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自治区“文革”形势影响深远的系列冤案。

新疆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边疆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错综复杂，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强烈：“阶级斗争为纲”制造的各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军区与生产建设兵团的矛盾；“一月夺权”、“二月镇反”、“三支两军”中军队的倾向性及往往直接插手地方两派斗争引起的军民矛盾；夺权引发的群众与原党政领导矛盾及权利分配中引发的造反组织之间的矛盾等等，造成新疆的“文革”局面及各种事件的背景和影响，远较内地为复杂多端。不了解当时情况者，容易迷离于其扑朔纷纭的表象。

石河子“一·二六”血案，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积怨已久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一月夺权”风暴夺权与反夺权斗争和冲突中的集中爆发。

石河子原为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经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十万军垦战士的开垦，到“文革”前夕，已成为拥有30万人、城乡结合的城市。

石河子又是当时“反修前哨”的战略要塞。兵团司令部设在乌鲁木齐，而重要机关却大多在兵团。这里有兵团农八师、工二师、工一师（工四团）、兵团交通部所属汽车二团、八一糖厂、八一毛纺厂、兵团独立团、兵团农学院、兵团医院、兵团政干校、兵团设计院、石河子管理处等17个单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隶属于新疆军区的一支准军事部队，主要由新疆和平解放时原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来，辅之以支边人员。主要干部则由五十年代初入疆的解放军干部组成。六十年代初，新疆成为“反修前哨”，中央军委陆续抽调一批较大改变，转业到兵团各师任职。1965年后，又派丁盛任兵团副司令，裴周玉任兵团副政委，李荆山任兵团政治部主任。

“文革”前夕，兵团内部自上而下矛盾重重。既有因转业干部歧视、压制、打击“九·二五”起义人员和支边人员，而与后两者的矛盾，以及复转军人、支边人员与压在最底层的起义人员和自流人员的矛盾，又有兵团领导人之间解放军系统与起义干部的冲突，还有奉命改造兵团的丁盛系的新干部与老干部的矛盾。

丁盛上任前，中央领导人给他交了底：要狠抓兵团的阶级斗争。因此，丁盛一上任，就批评原兵团领导人方向上犯了原则性错误。他在大会上宣布：“兵团对国民党起义部队，只团结不教育，只使用不改造，致使其中的不少人员，特别是一些起义机关没有得到真正的改造，至今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丁盛等人执行的阶级路线和歧视政策，既伤了起义人员的心，也触犯了兵团老领导和老干部，引起了兵团原领导人张仲翰和陈实等及许多师团干部的不满。

1966年7月，兵团在八楼召开学习毛主席“五·七指示”座谈会。此时正值全国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张仲翰大讲贯彻毛主席“屯垦戍边”的伟大意义，强调兵团如何符合“五·七指示”取得的巨大成绩，便一口咬定丁盛是罗瑞卿安插在新疆的“罗瑞卿分子”。参加座谈会的独立团团团长许光途，因乱上计划外项目。受到张仲翰等批评，于是以独立团党委名义，写信给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揭发八楼会议情况。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接到信勃然大怒。8月底做出决定：张仲翰“离职养病”，丁盛、裴周玉主持工作。

随即，丁盛凭借他们掌控的复员转业军人为主的兵团值班部队武装力量，开始在兵团全面夺权，自上而下改组各级领导班子。这比上海“一月夺权”要早了近半年。8月，武装部门接管政法部门的治安警卫；8月，接管看守所和看守警卫；11月，接管政法部门的武器和自卫武器。张仲翰、陶晋初、陈实、刘一村、王慎等被打成“张仲翰反党集团”。他们提出口号：“复转军人掌大权，九、六、八靠边站，自流人员滚他妈的蛋！”九，即“九·二五”起义人员；六，即五六年支边人员；八，即五八年支边人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化大革命，复转军人支持丁盛、裴周玉，成为“保皇派”；而支边人员、起义人员和自流人员，成了“立场坚定的革命造反派”。

1967年1月1日，石河子地区成立了“八一野战军总部”（简称“八野”），下设12个方面军，两个独立师，两个独立团。后扩展到20个方面军。成立之初，即有两万多

人，主要成员为兵团复转军人。总部负责人称“勤务员”，有潘苏灵、郭雄、邵定远等人。其后台为独立团团团长许光途、农八师主管武装的副师长龚建楚等人。并得到兵团和军区主要领导人支持。

“八野”的对立面为1967年1月23日成立的“石河子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简称“石造联总”），兵团农学院的红卫兵组织“革命造反团”（简称“兵农造”）为其核心组织。主要头头为彭正云。主要成员为受压制的支边人员、起义人员和自流人员，以及造反的学生红卫兵。其口号为：“打倒丁盛、裴周玉！”该派得到兵团原老领导的支持。

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刮到兵团，两派都在风风火火地筹划夺权。

1月17日，农八师武装处副处长张俊义、副科长王世昌，操纵“八野一方面军”，接管农八师政法科，夺走公章，宣布夺权，并于次日接管农八师总机，控制通讯权。

1月22日，八一糖厂“造反团”宣布夺权，但公章却让糖厂领导人给了“八野”的“红色造反司令部”。而且“造反团”夺权，兵团公安部不予承认，糖厂“造反团”几百人宣布绝食斗争。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1月24日晚，彭正云召集“石造联总”总部和农八师分站负责人会议，分析石河子地区形势和两派力量对比，研究夺农八师的权。因“八野”手持武器的值班部队冲击石河子总场“造反团”会场，会议中断，彭正云明令孙不怕、寇万福立即率两卡车红卫兵，赶到总场支援。

1月25日，八一糖厂“造反团”召开庆祝绝食斗争胜利大会，为“八野”的武装战士冲散。

1月25日下午2点，彭正云再次召集“石造联总”总部和农八师分站负责人会议，决定当晚六点半对农八师实行夺权。夺权以八师机关“造反团”为主，离农八师师部近的单位组织全部人马去支援夺权，离汽二团“八野”总部近的单位，组织人马去二团，牵制“八野”总。

与此同时，“八野”总部头头正在策划实行“赤色恐怖”。1月2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又称“红五条”。《决定》规定：废除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积极支持左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和组织，等等。

当日，许光途看到“红五条”后说：“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了，若造反派再胡来，我就打他个王八蛋！”当日，潘苏灵找到许光途说：“我们要在石河子搞一个赤色恐怖。”马上得到许光途的同意。

1月24日，农八师参谋邱吉荣对“八野”总部头头说：“左派、右派，我们心中有底。我们认为左派就支持，认为右派就镇压。造反团都是右派。”又说：“我们坚决支持左五条，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你们什么时候需要武装部队，我们就支持，要多少，有多少！”

1月24日，独立团单位召开会议，决定“支左”夺权。当晚，邱吉荣在农八师电影队楼上，召开石河子各单位“八野”头头开会，表示支持“八野”夺权，要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

1月25日，独立团打电话向兵团武装部请示，得到同意，调集8个武装值班连队集结待命。

同日，邱吉荣等去兵团请示，得到兵团副参谋长的答复：“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你们就干。”

当晚，邱吉荣等调来23团武装值班连队1连和4连、总场3连、师警卫连、基建处9连，共382名武装人员，到武器库和看守所集结待命。宣布：“必要时可以抓人，可以开枪。”并提出“四开枪”原则：“问三声不答应就开枪，叫站住不站住就开枪，捣乱会场开枪，有夺枪者就开枪！”

许光途向“八野四方面军”军长李松林说：“我们根据中央指示，接受八一野战军的要求。经兵团党委批准，支持八一野战军的夺权斗争！”许光途公开声称：“我要以鲜血染红石河子，不惜用生命保卫丁、裴、利，要干，干到底！”

1月25日下午6点钟，按“石造联总”总部安排，毛纺厂、石河子中学、经管处、汽二团的造反派约两千多人，以营救1月24日被汽二团“八野”从工四团抓去的“石造联总”战友为名，团团包围了汽二团团部和“八野”总部，并同前来救援的“八野二方面军”和“八野四方面军”近千人展开大辩论。“八野”头头赶紧打电话给独立团，要求派兵救援。独立团派出三营营长李树春，率92名荷枪实弹的军人，乘3辆卡车赶到汽二团。全副武装的军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锋枪冲进辩论的人群，“石造联总”派的汽二团“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头头张振奇下令，先将独立团战士围住，再缴他们的枪。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夺枪混战，“石造联总”夺得步枪19支，冲锋枪7支，手榴弹64枚，子弹1307发。并将这些武器，连同扣押的三营营长李树春和两名战士，用车押往乌鲁木齐，送交巡警进取，作为“独立团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证”。其中有3支被卸了枪栓的步枪，被毛纺厂工人带回厂里，藏进羊毛仓库。

至25日晚10点，“石造联总”另一路人马成功夺了农八师的权。几千人将师部机关大楼团团围住，逼农八师副政委晋怀中、李光、副师长龚建部、政治部主任杨廷柱4人签字，交出农八师党政财文大权。并强行接管了总机房。

独立团将汽二团抢枪事件上报兵团。当晚11点，兵团机要局长王宝铨跑到武装部作战室，命令值班参谋张振东：“你赶快把坦克团准备好，石河子发生暴乱了，抢了值班部队的枪。”

新疆军区将情况报告中央，说石河子地区发生了暴乱，抢了值班部队的枪。现准备出动部队。由于中央制止，坦克团未出动。

当晚，农八师主管军权的负责人在武器库，召开武装处参谋和农八师“八野”头头联席会议，研究向“石造联总”的“反夺权”。会议做出“四项决定”：1、支持“八野”“反夺权”；2、次日拂晓值班部队开进师部大院个，占领机关；3、部队进驻前，先由“八野”发出支援夺权的请求，后由武装处发表“支左夺权”声明；4、按拟定的名单，抓捕政

法科“石造联总”人员。会议研究了兵力部署、指挥位置、人员分工和车辆准备。会后，给值班部队增发了弹药。

1月26日凌晨1点。几十辆卡车开进毛纺厂，几千名军人和“八野”武斗人员包围了工人住宅区，封锁道路，切断电话线。独立团战士闯进工人住宅，强行搜查25日晚独立团丢失的枪支。搜查了3个多小时，一无所获。4点，独立团准备撤兵，但为“造反团”人员团团围住，非要辩论出个水落石出不可。

“八野”见势不妙，立即组织队伍，向包围独立团战士的“造反团”发起冲击。几千人密密麻麻挤成一团，互相推搡。一个矮个子的战士被人推搡，火气冲天，端起枪来，朝天就是一枪。枪声一响，全场霎时静了片刻。紧接着枪声大作，战士和军官手中的枪，有的朝天打，有的朝人群中开火。“造反团”吓得屁滚尿流，哭爹喊娘的惨叫声中，纷纷跑回家，赶紧关门。在事后的审查中，带兵的三营副营长韩玉泉供认：“四时许，部队被群众挤散，部队就打枪，开始向天开枪，群众要夺枪，不断开始向群众射击。当时我也挨了枪，是七连打的，约三五分钟，一边打一边退。”

毛纺厂住宅区血案中，当场打死4人，伤7人，送医院后又死1人。

1月26日晨7点，“八野”和独立团再次将毛纺厂住宅区包围，抓走“造反团”一些骨干。

中午12点，独立团撤兵，正好在木工厂附近大路上，与“石造联总”前去声援毛纺厂的大队人马相遇，被“石造联总”人员手拉手拦住去路。这时一个战士用刺刀刺伤了“石造联总”的郑小风，“石造联总”人员立即上去夺枪。工四团的子弟卫中伙同五六个工人夺了一支枪，他拿起枪就跑，被战士开枪打死。

而按武器库会议精神，“八野”在农八师的“反夺权斗争”，酿成了更大的血案。

1月26日晨，农八师机关“八野第一方面军工农兵兵团”反复广播《紧急呼吁》，紧急呼吁解放军根据中央支左五条，支援我们夺回党政财文大权，粉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暗暗送权的罪恶阴谋，使无产阶级的权力，掌握在真正的革命派手中。得到求援，武装部队派出军队，支持“八野”反夺权。

5点40分，“八野”大批人员冲进农八师师部，接管总机。6点，武装处调动4个连，对师部大楼实行武装占领，“石造联总”人员被赶出去。战士在大院布满岗哨，屋顶和阳台上，架起13挺轻机枪，3门60炮。随即宣布由副师长龚建章、萧凤瑞等5人主持八师工作，有倒向“石造联总”之嫌的师政委刘丙正等领导停职检查。

8点左右，“石造联总”总部调来几千人，后增至上万人员，将军人武装占据的各楼和总机房包围，要部队和“八野”交出权力，撤出农八师。

武装处赶紧又调动基建处9连赶来增援，又被人群围住辩论。9连指导员高砥平命令战士上刺刀，子弹上膛。他端着手枪喝令群众让开。兵团子女一校13岁的王万东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被高砥平一枪打死。部队顿时朝人群开枪，当场打死3人，伤6人。

霎时，愤怒的人群向防守部队冲了过去，前面的人开始夺枪。有的十几人围住一个战士，苦口婆心地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劝他们放下武器，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来。“造反

团”头头又组织人群继续包围和喊话要值班部队缴枪投降。值班部队全部退守于师部大院几座大楼内，架枪架炮固守，并回答：不交枪，弄火了再打！

10点，新疆军区参谋长何家产打来电话，命令双方脱离接触，问题由双方代表协商解决。

而“造反团”要部队交枪，惩办凶手，否则决不撤退。人群手挽手，高呼口号，一浪接一浪，继续向住上楼房的部队发起冲击。步枪、冲锋枪、机枪和楼顶的炮口杀气腾腾地对准人群。

11点半，新疆军区派出副司令徐国贤、副参谋长马森等赶到现场。但他们明显一边倒，又根本不到现场同群众接触，失望的人群加紧了冲击，不让部队往外撤。形势很紧张。

下午2点40分，带兵守卫办公楼的武装处副科长王世昌打电话给坐镇武器库的副处长张俊义，请示办法，张指示部队突围。10分钟后，奉徐国贤副司令命令，23团副团长高庆森打电话给武装处：值班部队立即撤出师部大院。王世昌电话通知总机房和东西楼部队，15点15分从北门强行突围，如遇包围，可鸣枪警告，驱散群众。

15点13分，守东西楼的部队撤出。一出楼，看到那么多人堵住去路，23团副营长李可志朝天就是一枪。顿时，部队指挥员全部开火，有的冲天打，有的朝人群射击。守卫北门的部队立即成战斗队形散开，卧倒后用步枪、机枪、冲锋枪朝密集的人群开火。大批部队朝北门、东便门和翻过土墙，朝八师武器库撤退。

密集的人群，在密集的枪声中，像打飞的鸭子，跑的、跳的、滚的、爬的、哭的、喊的，四散逃去。直到17点，部队撤完。

白雪皑皑，红血片片。八师大院内和北门外躺下了十几具尸体，有的中了十几枪。受枪伤的二十多人，被送往医院抢救。

撤至八师武器库的部队，经过短暂休整和训话，并分两路，撤出石河子。一路乘车向老沙湾撤去，一路步行经总场向23团撤退。

乘车撤退的部队杀红了眼。当路经石河子汽车站时，正好一辆客车进站，车站门口人很多。部队以为遇上了造反派，3辆卡车车顶的机枪和战士手中的冲锋枪一起开会，当场打伤9人，卡车疾驰而去。

三辆满载战士的卡车驶上乌伊公路，刚一转弯，迎面碰上高举红旗，手捧毛主席像的塔城地区托里县反修中学哈萨克红卫兵长征队，他们路经石河子，早晨刚去总场为职工进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演出”归来。车上有人大喊：“什么人？”手举红旗的帕利莎答：“红卫兵！”

“打死你们！”第一辆车上的机枪立即开火，当场打死1人，重伤3人。据红卫兵小报称：死伤者都是十六七岁非常漂亮的哈萨克姑娘。帕利莎面部中弹，倒在雪地上，手中还握着那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征队”的红旗。

16点，工程连乘车撤退到石总场汽车连附近，停在路旁，由三分场二连的“八野”武斗人员在公路上担任解决。这时，四分场九连的汽车也向这边开来，一见公路上堵了大批人

马，指挥员下令：“准备战斗！”举手就是一枪。顿时，步枪、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当场打死二连机务排长和炊事员。双方开始混战。待发现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时，已打死3人，多人受伤。

至此，石河子“一·二六”血案才算告终。值班部队共打死26人，打伤74人，其中包括误伤“自己人”20人。

新疆军区急电中央军委，说是石河子地区发生暴乱，一派抢解放军枪支，导致死伤，云云。

“一·二六”血案震惊朝野。周恩来下令，曾下令解散“八一野战军”。并指示严禁开枪，不准出动坦克，停止冲突，听候查处。

次日，根据中央指示，新疆军区派出7971、8010、8011部队进驻石河子市。驻军代表召集“八野”和“石造联总”代表协商，达成《四项条件》：一切组织所存武器弹药一律上交军队保管，如有违背，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确有证据的杀人、打人凶手，交解放军看管，一般群众立即释放；立即停止互相抓人、打人、抄家等做法；宣传以上三条。

由于中央要稳定军队，尤其新疆地处“反修前哨”，更不能乱。对于“一·二六”血案，新疆军区和兵团电告中央，是造反组织向兵团部队夺权抢枪，引起双方武装冲突。于是，中央将其定性为“双方武装冲突”。

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电告下降：1、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如有群众夺取部队武器，首先劝阻，不听，应向天放枪警告对武装反革命分子和过境窜入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敌人首先开枪时，才能自卫还击。2、新疆军区和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值班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和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务。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准冲击夺权。3、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在武装冲突、乌鲁木齐等地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立即停止，已抓的群众，必须立即释放。

“一·二六”血案对新疆的“文革”局势，影响深远。血案发生后，新疆自上而下都在利用死难者的鲜血大做文章。

“一·二六”血案后，“石造联总”要为“死难烈士”报仇，“八野”声称“石造联总”制造了“反革命暴乱”。两派当即互相抓人、打人、抄家，闹得天昏地暗。

1月29日，“石造联总”发布《第一号通令》，声称要逮捕“八野”头头、杀人凶手等十种罪犯。

1月29日，“石造联总”在石河子管理处广场举行“一·二六”血案控诉大会，万众激愤。一些“八野”头头和骨干被揪上台来，罚跪、揪头发、搞“喷气式”、戴高帽、挂黑牌等，会后游街示众。

“石造联总”在石河子地区搞了几天“红色恐怖”，掀起了抓、抄、搜捕凶手高潮，不少单位私设公堂，刑讯逼供。

“一·二六”血案，不仅给支持“石造联总”的新疆少数派组织以造反夺权的最好口实，也给全国造反派提供了“向走资派进行的这场夺权，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有力证据。1月28日，“保武（武光）反王（恩茂）”的“新疆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率18个群众组织发出《联合紧急通令》，指责《四项条件》“出卖原则，抹煞敌我矛盾，助长敌人气焰”。并在乌鲁木齐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王恩茂、丁盛被当作“八野”的后台，和“一·二六”血案的黑后台，受到猛烈攻击。新疆地区的夺权斗争进入新阶段。

而新疆军区领导人和丁盛，则要利用“一·二六”血案大做文章，既要整倒造反派，又要打击异己，制造冤案，借以巩固自身权力，进而一统新疆的大权。

于是，新疆自治区、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对石河子惨案作了如下定论：

石河子“一·二六”血案，是武光、张仲翰等人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制造的一次有计划、有组织、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是他们妄图在新疆实行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严重步骤。是“九·二五”起义人员要搞兵变。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大清洗。

武光因是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副主席、新疆军区第一副政委，与王恩茂、丁盛等素有不谐，“文革”中最先出来“亮相”，表态支持造反派夺权。1月24日至25日，因处理八一糖厂工人绝食问题，去过石河子。因此，自治区、军区和兵团派出的联合调查组，硬要兵团医专学生张秋英承认，武光在会上向他授意：“夺权要有几支枪。”始终为张拒绝。但仍以此为证据，将武光打成“现行反革命”、“大叛徒”，几度关押。

1966年12月9日，乌鲁木齐发生绝食事件，张仲翰被中央招致北京。1967年1月16日，又被揪出批斗，失去人身自由。1月22日，“八野”派的兵团机关“联总”把张仲翰从北京揪回新疆。1月29日，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召开批斗仲翰大会，会后即军区部队押管。30日即被当作“一·二六”血案的“幕后黑手”，押往北京问罪。

兵团参谋长陈实是丁盛急于打倒的对立面。“一·二六”血案发生时，陈实为躲避两派批斗，正藏到他弟弟陈殿信家。军代表调查组按上司授意，硬把“策划者”的屎盆子往他头上扣。刑讯逼供，要陈殿信改口，结果逼死陈实两位亲人。

1967年2月～5月，新疆先后大刮起“二月镇反”、三月军队“支左”和军管风，新疆的造反派遭到残酷镇压。自治区、新疆军区、和兵团领导人大力支持新疆的“八野”、“联总”、“工农革委会”和“红促会”等多数派组织，大规模抓人、打人、捕人，实行高压恐怖。那些在“一·二六”血案中受伤活着的受难者、当天的参与者及家属，有的被批斗，有的被关押，有的扣发工资。

石河子总场为“八野”召开声势浩大的万众平反大会，会场周围架设轻重机枪和60炮，31个“造反团”头头和骨干被批斗。会后，游街示众，开除公职，认罪检查。

根据军代表调查组的调查材料，新疆军区以“一·二六”“肇事者和凶手”的罪名，逮捕了46名“罪犯”，长期关押6年多。蒙冤受屈，遭受严刑拷打，百般凌辱。而真正的凶手长期逍遥法外。

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事记》载：事后，逮捕审讯49人，逼供致死6人，1000余人受株连。3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将在北京的张仲瀚留京监护，隔离审查。不久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进行监护审查。

3月28日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裴周玉任主任，丁盛任第二主任，李荆山、王振东（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任副主任，杨贯之（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等9人为常委。随即布置在兵团进行全面夺权。3月30日至5月8日，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先后作出错误的决定，呈报新疆军区，将兵团副司令员陶晋初、参谋长陈实、副参谋长曾继富、干部部副部长杨兆元、计财部部长毛乃舜、供销部代部长陈明池、石管处副政委汪培模、农一师师长林海清、工二师师长傅志华、农六师政委赵予征等10人停职反省。6月，中共中央决定：任命裴周玉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丁盛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丁盛、裴周玉一派成为血案后的大赢家。

直至林彪事件后，丁盛一度失势，46名“案犯”才获得释放。丁盛后因追随“四人帮”而倒台，此案重新裁定。但一切罪名，皆由丁盛个人顶缸。

1978年12月20日，新疆自治区党委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对该案重新定性，认为：“这一事件是丁盛、裴周玉及其帮派一手策划的武装镇压革命群众事件，死伤百人全是他们蒙蔽指挥值班部队开枪打的。这件事与张仲翰、刘丙正等同志和武光都没有关系，应予平反昭雪。”

1979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该处理意见。

1979年1月19日，新疆自治区党委做出《关于处理新疆文化大革命中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按上述精神，为受害者平反。

□ 来源：“博客网·余习广博客专栏”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